

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研究近代中国文化首先就要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近代文化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要回答这一个问题，首先涉及我们对近代历史怎么看。文化作为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对近代历史估计不准确，那么对近代文化也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估计。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后的。近代中国确实是落后了。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下，日益陷于贫困落后。但中国的落后，不是近代才开始的。事实上，至少从明朝以后，尤其是清朝统治期间就已经落后了。当时的欧洲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迅速地发展。而这时的清朝，没有发生文艺复兴，也没有爆发产业革命。鸦片战争前的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后期至道光年间，对内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对外闭关锁国。结下的恶果，是鸦片战争的惨败。

鸦片战争失败后，加深了中国的落后。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面。近代中国的历史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不断追求、探索改变中国落后贫困的道路。外国侵略者的大炮吓坏了清朝的皇帝和腐朽昏庸的官吏，但人民群众却前赴后继地奋起反抗，一些士大夫也在大炮声中惊醒起来，反过来向西方寻找救国的方案。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为使中国独立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近代历史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着这一历史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比起古代文化来，应该说近

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古代文化有辉煌的成就，但近代文化毕竟向前发展了。当然举局部的或个别的例子去比，近代文化有不如古代文化的，但从整体看，从发展趋向看，可以肯定近代文化是进步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文化相对单一。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社会，变化相当大，出现了新的因素。在近代，除原有的封建经济外，又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 and 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①。显然，近代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文化整个系统比古代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那么，近代文化究竟有什么特点呢？下面所谈的，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准确与否，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 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近代中国文化同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道路不一样。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从 14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15~16 世纪进一步发展，17 世纪兴起科学运动，18 世纪法国开展了启蒙运动，之后德国又出现了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则与此不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基础、政治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95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力量，以及思想文化条件。就以思想文化的情况而言，18世纪正当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利用修《四库全书》禁毁、删改书籍。同时引导知识分子埋头于科举八股和繁琐考据，使人们严重脱离实际，思想禁锢僵化。这种状况，与蓬勃发展的法国启蒙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化，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了变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又互相会通融合，形成了资产阶级新文化。

西方文化传播进来之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矛盾冲突。这是由于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儒学，特别是到鸦片战争之前，儒学的核心内容是封建的伦理纲常，讲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套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不是一个系统，一个类型。从已经凝固的文化心理、感情、观念出发对于西方文化是难以接受的。譬如人所熟知的1867年关于在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就引起一场大争论。大学士倭仁等守旧分子“以道学鸣高”，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师事夷人”学天文算学，认为这样一来必将“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鼓吹“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等谬论。

不仅统治阶级内部表现出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在农民起义内部或与统治阶级之间也反映了这种矛盾冲突。太平天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其中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男的都是兄弟，女的都是姊妹的思想。这一思想触犯了封建伦理道德，把君臣、父子、夫妇等尊卑贵贱秩序颠倒了。这当然与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不相容，也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曾国藩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发布《讨粤匪檄》。檄文中攻击太平天国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

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以此来号召和吸引地主阶级当中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反对太平天国，卫护封建文化。这说明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反映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当然，后来曾国藩也有变化，成为洋务派，接受了某些西方文化。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教案”，反教会斗争一直不断。外国传教士到中国设立教堂，其中有些人横行霸道，充当间谍，到处搜集情报，干预中国内政。中国人民反对利用教会进行侵略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是爱国的。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同传统文化本身是不同的，例如敬孔祭祖，两者是不相容的。从文化史角度看，“教案”除具有人民反对外来教会侵略、压迫的性质外，还包含不同文化心理、感情、习惯的冲突。这里既有民间老百姓，也有绅士和官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具有相同的传统文化心理：尽量防守自己的东西，不要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传进来后，不断地出现矛盾斗争，当然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的冲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泛，影响也更深刻。

中西文化间有矛盾冲突，同时也有会通融合。这种情况贯穿在整个近代，1895年中日战争后就更加明显了。那时，一些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这样的主张。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①。严复则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②。后来，孙中山也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③。

①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95页。

②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③ 《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七）第60页。

概括地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是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是毫无疑问的，所缺乏的是同英国对抗坚船利炮。后来，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到了洋务运动时，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本体，不能变动，在这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即技艺。用中学来包融西学，反映了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的较低层次。也可以说，这是不可避免经历的阶段。人们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社会的发展也是这样。“西学为用”这一主张，在清朝统治者内部态度很不一样，矛盾很尖锐。事情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不是很简单就实现了。当时人们认为传统文化体系不能动，可以学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然而没有这一阶段，也就无法向前发展。“西学为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潮流，对社会缓慢地产生影响，虽然缓慢，但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纲常，受到了冲击。所以，顽固派害怕得不得了，拼命加以反对。到甲午战争后，人们的思想又前进一步，不再是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文化，而是要吸收西方的进化论、民权思想和政治制度等。康有为要建立君主立宪，孙中山要搞民主共和国。在这时，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变化愈来愈大。所以，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发展到一个高潮。

从个人的情况来看，如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都表现出对中西文化不同程度的会通融合。孙中山曾经对他的学说的建立作了概括，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

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①。孙中山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有选择而不盲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如此，最终是自己的创造。所以，他的三民主义学说是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独见而创立的。

这里还需要谈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较大规模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一次是汉代以来，印度的佛教传播到中国。一次是明末清初，来华西方耶稣会士传播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技术，但没有传开，只在像徐光启这样少数士大夫中产生了影响。由于传教士干预清朝内政，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投入监狱。与此不同的，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传播开了。但是，佛教文化同儒学文化相比最多是同层次的文化，也许比儒学还低一些，因而容易被中国文化所消融，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近代则与古代不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同质的文化，是不同层次的文化。当时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儒学中的汉学、宋学在西方文化面前都无能为力去消融西方文化，而是败了阵。可以说，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新文化中，西方文化占主要成份。

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说近代在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发生了资产阶级新文化，并不意味着全国都是一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很不平衡，影响了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沿江沿海的城市，出现了中西文化的混合存在，在广大内地村镇却仍然固守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自民族传统。这种现象，在现在一些地区仍可以看到。在这些地区，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的不平衡状况要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情，是长期的，需要有一个过程。要充分了解中国的国情，文化也是中国国情。不能不努力去改变，也不能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在短期间就可以实现。

二 近代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用四个字概括：民主、科学

这一口号是五四运动中提出的，“五四”之前没有明确的口号。但在鸦片战争后，有见识的中国人都在为此探索追求。关于科学，鸦片战争后有眼光的人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后来又认识到还要学习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甲午战争后，从严复在《天演论》序言中提出学习科学的方法论，直至主张学习社会科学各方面的知识，反对愚昧迷信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五四运动提出“科学”的口号作了长时期的准备。

民主方面。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介绍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渐渐多起来。人们认为，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权偏于下，君主权偏于上，君民共主权得其中。士大夫所以称赞君民共主，反映了他们缺乏应有认识和足够的勇气去抛弃君主。1895年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维新运动，要改变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从事实际的改革，虽然失败了，却是近代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环节。由于维新思想家的宣传，民权思想在知识界中有着重大影响。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是民权平等，同传统文化的纲常名教不相容。张之洞就竭力反对民权说，他在《劝学篇》中鼓吹“君臣之义，与天无极”，扬言“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无一益而有百害”。从反面可以看出，民权思想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冲击。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民主共和，皇帝不要了，比康梁更彻底。正因为民主思想的传播、发展，才有“五四”时期“民主”口号的提出。如果没有长时期的思想启蒙，对封建文化的涤荡，如果还像鸦片战争前那样愚顽，那么也不会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

学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口号，在现实社会中封建残余还不少。

三 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

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发展是被动的，不像西方文化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就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在外国的挑战下被迫应战的。所以是学习西方又用来反对西方侵略者，即魏源的名言“师夷制夷”。封建统治者抱着“天朝上国”的观念，原来是很看不起“夷人”，以为“夷人”没有礼义纲常，如禽兽一般。时至 19 世纪 70 年代，还有个士大夫叫李元度的，异想天开地说：现在交通方便，把世界的距离缩短了，这正是利用轮船、火车等近代交通工具向西方输送圣道的好机会，以拯救西方，使他们免沦为禽兽。李元度还是抱着“用夏变夷”那一套愚顽陈腐的观念。与此相反，有见识的中国人则是要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救国的东西，提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甲午战争清政府败于日本，引起了中国社会很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是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维新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一次救亡图存的运动，也是一次文化革新运动。这次文化革新，从政治、教育、史学、文艺到体育卫生、风俗习惯等，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单就文艺说，就有“诗界革命”、“散文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等。文化革新运动是在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推动下发展的，反过来又为这一政治运动服务。维新家们就是通过新文化来“开通民智”、“改良社会”，以唤醒国人振衰起弱。此后，文化就沿着这个轨道发展下去。辛亥革命时期的“陶铸国魂”，后来的“改造国民性”，都是革命的需要，为了改变中国的积弱落后。

还可以举诗歌为例，来加以具体说明。鸦片战争后，魏源写

了《寰海》诗，对清朝统治的腐败，英军对华侵略，深表愤慨。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首倡者之一，他的诗集《人境庐诗草》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女革命家、诗人秋瑾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敢把乾坤力挽回”，表达了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从近代诗歌中贯穿了强烈的爱国、救国的精神，可以看出近代政治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两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也使得近代文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特点。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近代政治与文化的密切结合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近代 80 年政治事变和运动频繁交替，思想文化变化也很快，当时的维新思想家或革命家都要求文化为政治服务，因此，就不恰当地强调了致用，即过分的功利主义，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重视不够。正因为把文化看成政治的附庸，忽视了文化的独立性，从而影响了它的成就。例如，晚清小说很盛行，好的作品并不多，戏剧也是这样，失去了生命力。从近代文化的特点看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 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 没有完整的体系

相对来说，鸦片战争前文化比较单一，变化也不大。封建文化的中心是儒学，从两汉到后来的明清，不论汉学、宋学，不管哪一学派，都未逾越儒家的东西。宋明理学重解经，乾嘉考据重注经，都未离开儒家经典及其思想范围。

近代以后，文化类型除原有的传统文化外，有资本主义文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同封建主义文化一样对今天仍有影响，那种媚外文化心理还在泛起。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化有顽强的传承性。

近代文化除多种文化类型并存外，它的丰富性还反映在各个

领域、部门的变化，亦即向近代化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传统文化中一些领域到此时衰落了，如最重要的经学的衰落就是明显的例子；也表现在许多新的领域的出现，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教育等都有明显的表现。清朝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西学源于中国”。看来一些人是为了减少向西方学习的阻力而找的理由，既然西学是为中国原来就有的，后来传到西方，自己反而失传，现在要回归而不是“师夷”。还有一些人以此来抵制学西方的文化，西学本来是中国固有的，根本就不必再去向人家学。但是不管哪种说法，都缺乏根据。西学传播的潮流并未因此而受阻遏，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也没有因此而停顿。

继自然科学之后，哲学发生了新的变革。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风行一时，影响到维新派、革命派，也影响到整个学术、文艺等领域。用进化论代替传统的变易思想，是哲学领域一次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民权学说在近代的兴起，这在政治思想领域是新的课题。有些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就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如“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但中国古代的“民贵君轻”思想同近代的人文主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以君主制为出发点，管理人民，稳定国家；而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的中心内容是个人主义。新的文艺思潮在清末也传入中国，大量外国小说被翻译介绍，话剧、电影、西洋音乐和舞蹈、油画、漫画、体育，以及西方的建筑艺术等，都在传播流行，大大扩展了传统文艺的领域。20世纪初年，教育方面进行了全面变革，制订新学制，普遍建立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制度，停办书院。以上所述，只是举出若干明显的事例，不是全面情况。但就此也可看出文化的丰富多样，反映了近代化的发展趋向。

文化的近代化，不仅表现在新的部门的兴起，同时也体现在对传统领域用新的观点、方法进行研究，加以改造。像史学这样

古老的传统部门，在 20 世纪初年也发生变化。梁启超鼓吹“史学革命”，他认为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谱，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提出建立“新史学”的主张。夏曾佑编撰的《中国古代史》，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一反过去史书的写法。蔡元培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清末曾到德国留学，受西方哲学、伦理学的影响，对中国自先秦至明清的伦理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第一部用新观点、方法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王国维受到康德、叔本华等的哲学和美学的影 响，最先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 美学，并用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都突破了传统，开拓了新路，成为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在学术研究中，他的成就也很大，宋元戏曲、甲骨金文、古史考释对学术界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传统文化素养很深，又接受了西方的方法，这样他的研究显然就超过了前人。至于佛学的研究，也与古代不完全一样，具有近代的新特点。近代文化的种种变化，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举。

文化的近代化，还表现在人的观念的更新。随着鸦片战争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本身的变化，人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更新，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发生怀疑和反省，甚至抛弃。“天朝上国”、“华夷之辨”这些以为傲视于人很深的传统观念，在近代逐渐被破除了。冯桂芬写的《校邠庐抗议》说：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敢于承认“天朝上国”有不如“夷”的地方，是需要有识见和勇气的。只有承认不如人家，虚心地学，才能进步。又如“君权至上”和“公仆”的观念。封建社会的君权至高无上，臣、子不听命于君、父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戊戌变法时期，严复在《辟韩》中说，君主是民众推举出来管理社会、为民办事的，王侯将相是通国的“公仆隶”。孙中山更明确地说，总统、官吏都是“公仆”。这种思想的更新在社会上虽然不很普遍，然而就变化本身来

说是重大的。又如贵贱尊卑与平等观念。封建社会的特点是等级制度，到近代人们主张平等。谭嗣同说五伦中除朋友一伦还算平等外，其余都不平等。以平等思想反对封建等级观念，是一大进步。顽固派则视之为无父无君，如洪水猛兽。总之，社会的变化导致观念的更新，而观念的更新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从整体上说，近代文化比古代文化丰富复杂，但又存在着肤浅、粗糙。梁启超在评价 20 世纪初的译书热潮时曾说，那时的译书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分，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末人们追求新知识的渴望，也反映当时对新文化了解的浅薄。所以，一直到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争取中国的独立，力求改变落后贫困面貌的历程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它比起古代文化是向前发展了，是进步的。那么，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又居于甚样的地位呢？

近代文化既批判地继承了古代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它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没有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就不可能有五四运动，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以，近代文化承前启后，是联接古代与现代文化的桥梁。对于它既不可以简单地贬低，也不能随意地夸大。近代文化的主要线索是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对今天来说，还有它的现实性。我们如果能很好地了解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就较容易清楚地理解目前又掀起讨论的中西文化问题。现在的讨论实际上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再现，无非还是两种主张，一种是“全盘西化”，一种是“复兴儒学”。两种主张在“五四”前后就开始激烈争论，争了几十年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国既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走孔子的路”，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现在重新提出这两种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不对的，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思想混乱，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应当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点出发，不论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 （1987 年）

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

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起步，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文化”一词的近代含义，近代文化的结构、发展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

“文化”、“文明”，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文明”一词，在《尚书·舜典》中就已出现，所谓“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文化”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则较“文明”为晚。《易·贲卦》的《彖》虽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已是秦汉时儒生对《贲卦》的附会，且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倒是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把“文”与“化”联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刘向所说的“文化”，并不是整体词，而是各有独立义，“文”指文德（与“武力”相对），“化”指教化，即以文德来教化、感化。尽管如此，却也反映“文化”一词的衍变过程。此后，如晋人束皙、南齐王融的诗文中曾有“文化”一词。束皙的《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显然，他们已把“文化”作为一个词汇使用。这里所说的文化，其含义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既有稳定性，又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变异。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和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动，语言词汇也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词的创造或外来语的借用，只是语言词汇的一种变化。词汇的另一种变化，是旧词被赋予新义。“经济”、“社会”等都是中国固有的旧词，但在近代它们的含义变了。“文化”一词，也是如此。

“文化”这个词具有近代新义，大约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时的报刊，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撰述中，都出现过“文化”一词。鲁迅专门写了一篇《文化偏至论》论述文化问题，发表在 1908 年的《河南》杂志。不过比较起来，当时报刊使用“文明”这个词要比使用“文化”一词为多。

就当时发表的撰述中对于使用“文化”一词的含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 与文明同义。例一，谭嗣同《赠梁莲涧先生序》：“濒海有山焉，曰崖山。自宋以后，颇著称于时。……惜为地球之半圆弧面所隐，使削其弧而弦以径之，将直见文化早辟，几乎《春秋》之太平，《礼运》之大同”^①。例二，《湘报》第 92 号《学会汇纂》：“泰西有文化之国，其战必守公法者，彼非乐于守之，恐己不守，将致人之仇，怒人之报复耳！……楚本蛮野，宋襄公以文化之国待之，故大败。”例三，匪石《浙风篇》：“吾中国国民，非同统一统系于黄帝者乎？虽然二千年前文化未开焉。凡文化未开时之住民，常被治于天然之感化力”^②。

这些例子中所说的“文化”，都是与“野蛮”相对待而言。所谓“文化早辟”、“文化之国”、“文化未开”，均与“文明”同义，可以用“文明”一词代替。事实上在当时人的一些撰述中，往往有互用的情况，没有严格的区分。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 281 页。
《浙江潮》，第 4 期。

2. 广义的 包括精神和物质。例，《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伏羲、神农之时，民智渐启，中国文明之滥觞，实始于斯时。燧人氏作火食，有巢氏作巢法，伏羲氏画八卦、教佃渔、造书契、作甲历，神农氏艺五谷、制医药、立商廛，盖当时文化甲于诸族”^①。

这里撇开这些古代传说的可信程度如何不论，就作者的论述而言，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起源的探讨，涉及饮食、居住、农耕、渔牧、交换和文字、历法、医药等诸多方面，显然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

3. 狭义的，单指意识形态而言。例一，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雅典人所自负者 欲全希腊文化之中心点集于其国也 故务使国民有高尚之理想，有厚重之品格，有该博之科学”^②。例二，别士《小说原理》：“今值学界展宽，士大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③。例三，《支那教育问题》：“其学术之程度 则日本以吸取泰西之文化，程度较高”^④。

这里的“文化”指的是思想品德、学术、科学、文艺等，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当时对文化并没有下定义，也没有对什么是文化进行过讨论，他们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需要来使用“文化”一词，因而其含义就较为广泛。但是，不论作者作何种理解，从上述三种情况看来，文化的含义已不完全是中国古代所指的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而是具有近代西方的词义了。

《江苏》，第 4 期。

《新民丛报》，第 1 号。

《绣像小说》，第 3 期。

④ 《新民丛报》，第 24 号。

“文化”词义的变化，以及使用频率的增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反映了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早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严密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具有特别的稳固性。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既是文化的指导思想，又是文化构成的主干；而它的核心则是忠孝节义的纲常伦理。封建的纲常伦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之常经”，是“万事之根本，百川之源头”。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具有单一性、凝聚性、稳定性，对于外来文化，或是抗拒排斥，或是吸收消融。因此，虽有几次较大的外来文化的输入，但始终没有突破、改变传统的文化体系和结构，而只是儒学文化体系自身的衍变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衰落的清封建皇朝没有力量抵挡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样，在文化上，封建的儒学文化体系也无力守住阵脚而败下阵来。西方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有识之士传播的结果，利玛窦、徐光启们并没有能够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的愿望和活动，“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①。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根源在于近代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有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发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西方文化才能被吸收并变成成为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